璐易思・瑪芮 vs. 茱蒂思・巴特勒

兩種女性主義社會建構的身體觀

吳秀瑾 (中正大學哲學系)

非常弔詭的,女性主義身體觀從柔性身體或是身體習性分析中達成其政治宣告,取消了抽象的主體性傳統,代之以身體體現(embodiment)的優先性。但是,其體現的政治分析呈現的是身體如何被紀律化、正常化和溫馴化的現代化過程,或是在社會場域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所累積的身體技能與實踐。柔順和習慣的身體不是能動的主體,只是更長久不衰地依附並鞏固了既存的父權結構。可見,如果女性主義身體觀仍然循著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路線,那麼勢必得面對根本的難題:柔順的身體要如何抵抗?習慣的身體要如何更新?抵抗與更新不需要假設主體性嗎?如何才能貫徹女性主義要取消抽象的主體性,同時又可以身體行動爲施爲(agency)的核心,得以進行相關的政治運動,從而抵抗既有權力關係,帶動社會改變?

本文的中心議題將試圖解決女性主義身體觀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的困境。受限於篇幅,本文僅將焦點放在瑪芮(Lois McNay, 1999; 2000)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93; 1997)所分別代表的女性主義身體觀。McNay 和 Butler 身體觀的對比就不僅僅只是反映了各自對 Bourdieu(Pierre Bourdieu)和 Foucault(Michel Foucault)身體觀的理論偏好,還進而凸顯了兩者從性別角度來修正身體觀的見解,從而對女性主義身體政治的發展有所貢獻。兩相比較,誰的身體政治觀點可以貫徹女性主義要取消抽象的主體性,同時又能以身體爲施爲(agency)的核心?哪一種女性身體觀,才能抵抗既有權力關係,帶動社會改變?是二擇一的單選題?還是複選題?

本文的結論是:McNay 和 Butler 身體政治的對比,並非非此即彼的單選題,而是發掘兩者身體觀理論與實踐的互補性與互見性,McNay/Bourdieu 偏好社會習性與場域的物質結構面向,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從結構中產生對文化主流的衝突與改變;另一方面,Butler/Foucault 偏重於主體化的意義與其相關符碼,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意義結構底層的物質基礎。可見兼顧意義結構與物質結構對身分認同的關鍵作用,才不會淪於決定論與意志自由兩端,身體政治必須從分析女性如何在規訓中產生抵抗,在被社會收編中獲得其自主性,超越宰制與服從的簡單二元性。以上兼容並蓄的理論特點,表現了女性主義身體觀意圖貫徹女性主義企圖取消抽象的主體性,同時以身體爲施爲者的核心,得以建立有效的身體政治實踐的相關經驗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策略。

關鍵詞:瑪芮、巴特勒、傅柯、布爾迪厄、施為者

一、前言

眾多相關研究顯示: Michel Foucault的柔性身體(Docile Bodies)¹和 Pierre Bourdieu的身體慣習(Habtius),²都是女性主義身體觀的分析利器(McNay, 1992; 1999)。女性主義不只是從意識覺醒的角度來分析性別不平等,還更進一步地從作用於身體的技術與習慣,來進行更深層的性別批判。比如:女性主義對於「女人柔順身體」(docile bodies of women)、「母乳政治」和「子宮切除」等身體論述,³ Sandra Lee Bartky所描述的女人為了追求「美麗」而進行的化妝、使用用來減肥塑身的各種商品、行頭、道具與技術等,呼應了

致謝辭:特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的寶貴指正,指出本文在表達上嚴重 缺點外,並且在翻譯、遣詞用語與理論的蘊涵意義上給予種種修正意見,受益良 多。

- Foucault (1979)從各種社會機構如學校、工廠、軍隊、醫院和監獄中,仔細地描述作用於身體上的各種不同的規訓技術,如時間表、空間配置、圓形監獄等技術,以最細微的分割、最低的成本,對可塑性高的身體進行嚴格與細密的矯正與訓練,達到對身體使用的最大效率,成就現代工業與資本主義社會高效益的人力管理和經濟繁榮。
- 2 根據 Bourdieu(1977)對慣習(Habitus)的定義:慣習是持續與可置換的性向系統,該性向(dispositions)系統是源自於客觀規律的社會條件,因此系統化的偏好是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從而支配、影響與主導個人的行動與實踐,是可結構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按此定義,慣習一方面指涉的是個人的衣著、體態、性格、習慣、志趣與想法;另一方面指涉的是個人性向的社會生成條件。
- 3 關於「女人柔順身體」這個部分的文獻很多,筆者所參考的主要是 Bartky (1997), Bordo (1997), Butler (1993), Gatens (1996)。「母乳政治」所描述的是當女性生育之後,必須在母乳與配方奶之間做出選擇,亦即面臨到是否哺乳的決定,以此批判檢視「母乳最好」是如何被建構為科學與真理的過程,請參考 Law (2000)。至於通俗的醫療書籍對女性身體/真理/權力的建構,請參考蔡宛容(2001)。

Foucault 所指出的作用於身體的所有瑣碎細節其所浮現的女性愛美的「天性」。女體的紀律與規訓或是女體在社會場域中的千姿百態,都可進行相關的身體政治分析,身體一方面揭示了既定的社會歷史結構關係,而在另一方面卻又遮蔽了埋藏於身體背後的特定社會歷史結構關係。

為什麼身體既揭示又遮蔽?為什麼要以身體作為分析權力關係 的重心?為什麼不從意識形態批判來進行權力關係的分析?本文所討 論的女性主義社會建構論的身體觀,主張身體政治的重要性,除非透 過相關的身體政治分析,否則我們將無法察覺身體所佔據的空間、說 話的音量、眼睛的注視等等舉手投足的細微與不經意的動作,處處都 顯示出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定位。因此,女性主義社會建構論者的身 體觀和向來以心識為本的主體性哲學,形成了類似於 Thomas S. Kuhn 所謂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身體政治分析強調的是身體 所體現的計會權力關係,而計會權力關係又和文化、政治、經濟等計 會行動密不可分。再者,身體體現凸顯了人類活動的歷史先決條件與 計會制約,顯示身體的慣習對於信念體系(意識形態)的經久維護。 反之,傳統的主體性哲學則主張個體的自主性、獨立性與超越性,主 體行動可以有效地擺脫物質條件的制約與束縛,個人的自由即在於紹 越身體如地心引力般的慣性作用。簡言之,典範轉移乃從心識為本的 主體性哲學轉向以身體慣習為本的政治行動。前者的主體行動以理性 為優先,理性主導信念,一旦信念轉變或意識覺醒,便隨之產生改革 行動,造成全面性的社會影響;反之,身體的社會建構論所顯示的則 是,主體性和身體並非意義建構的起點,而是被建構的文化歷史產 物,所謂的主體性不過是虛構的,個人實乃依附於社會的生產條件與 關係之上。

綜上分析,身體觀的轉向,足以顯示身體是整個社會與歷史的印 記,不是光靠思想上的豁然開朗,就可以馬上擺脫的。更常見的是, 即使在思想完全改觀之後,身體慣習的持續,更見證與嘲諷了意志自 中與思想的優勢,原來意識形態最牢固的維繫者,不是集體被陰謀操 弄的錯誤意識,而是長久、局部而且不存在陰謀論的狀況下,身體所 體現的權力結構。非常弔詭的是:無論是從柔性身體或是身體慣習分 析觀之,女性主義身體觀無不試圖藉此達成其政治宣告,以取消抽象 的主體性傳統,代之以身體體現 (embodiment) 的優先性。但是,身 體體現的政治分析所呈現的卻是身體如何被紀律化、正常化和溫馴化 的現代化渦程,甚或是某種在社會場域的日常生活中,歷經長期的耳 濡目染之後所累積而成的身體技能與實踐。柔順和慣習的身體非但不 是能動的主體,更可能只是經久不衰地依附並鞏固既存的父權結構 (Bourdieu, 2000)。可見,如果女性主義身體觀仍然循著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路徑,那麼勢必得面對幾個根本性的難題:柔順的 身體要如何抵抗?慣習的身體要如何更新?抵抗與更新不需要假設主 體性嗎?如何才能貫徹女性主義所要取消的抽象主體性,同時又能 夠以身體行動為施為(agency)的核心,⁴從而進行相關的政治運動, 抵抗既有權力關係,帶動社會改變?

本文將試圖解決以上女性主義身體觀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的困境。受限於篇幅,本文僅將焦點放在 McNay (1999; 2000)和 Butler (1993; 1997)個別代表的女性主義身體觀。McNay (1992)從早期以

⁴ 對 agent 和 agency 的中譯包括行為者/行為、主體/主體性、行動者/行動、作用者/作用,但是以上的中譯都多少帶有 subject (主體)能動性的含意,為了更明顯地區分 subject 和 agent,本文採用匿名審查者所建議的施為者(agent)/施為(agency)的中譯,有效避免主體能動性的含意,感謝指正。

Foucault 為研究重心,轉變成近年來以 Bourdieu 為研究主軸(McNay, 2000);相對的,Butler 則是發揚了 Foucault 的身體觀。乍看之下,McNay 和 Butler 分別傳承了 Bourdieu 和 Foucault 各自發展的身體觀,於是兩人如何解讀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特色與差異,也應充分反映在兩人對身體觀的不同主張上,5 但是,更重要的部分在於雖然 McNay 和 Butler 分別深受 Bourdieu 和 Foucault 身體觀的影響,但是兩人也不僅只是一味承襲他們的思想而已,而是進一步從性別角度來修正與拓展 Bourdieu 和 Foucault 兩人身體觀的性別盲點所造成的理論限制。是故,McNay 和 Butler 身體觀的對比,就不僅僅只是反映了各自對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理論偏好,還進而凸顯了兩者從性別角度來修正身體觀的見解,而對女性主義身體政治的發展有所貢獻。兩相比較,誰的身體政治觀點可以貫徹女性主義要取消抽象的主體性,同時又可以身體為施為的核心?哪一種女性身體觀,才能抵抗既有權力關係,帶動社會改變?是單選題,還是複選題?

本文配置如下:第一部分將討論 McNay 和 Butler 各自的身體觀特色,其中 McNay(1999; 2000)透過分析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理論差異,⁶凸顯了她如何理解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

⁵ 當然,兩人如何解讀 Foucault 和 Bourdieu 的身體觀不見得具有無庸置疑的說服力,也肯定會遭受其他研究者對其理論解讀的挑戰。當 McNay 和 Butler 各擁一方並進而發展女性身體政治之際,本文作者反而抱持著 Foucault 和 Bourdieu 的身體觀並非毫無交集,而是可以匯聚。受限於篇幅,本文不擬討論 McNay和 Butler 對 Foucault 和 Bourdieu 的身體觀解讀是否正確與具有說服力,主要將討論核心放在兩人如何依據各自承襲的身體觀去發展女性身體政治,對比分析兩種女性身體政治的特色與差異,尋找有效身分認同的政治行動。

⁶ McNay (1999; 2000) 對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理論的對比,分析 McNay 所列舉的四點差異,分別是(1)身體的時間性 vs. 無時間性 (temporality/atemporality);(2)前反身性 vs. 反身性 (pre-reflexivity/reflexivity);(3)投

特色與差異,也標明了 McNay 身體觀的立場。接下來綜合整理出 Butler 身體觀的特色,並且分析和 Foucault 身體觀的異同。第二部分 將以交叉詰問的質疑方式,探討與分析 McNay 和 Butler 間的理論爭 議與根本歧見,從而凸顯出兩派不同的女性身體政治之不同路線。前 半部將分析 Butler 對 Bourdieu 身體觀的主要批評;後半段則是探討 McNay (2000)對 Butler 批評 Bourdieu 身體觀的進一步批評。最後, 本文的第三部分將概括評論 McNay 和 Butler 女性主義身體觀的理論 優劣,毫無疑問的,兩人分別深受 Bourdieu 和 Foucault 身體觀的影 響,但是兩人也不只是繼承他們的思想而已,而是更進一步從性別角 度來修正與擴展 Bourdieu 和 Foucault 身體觀中的性別盲點所造成的 理論限制。McNay 認為唯有充分掌握社會慣習與社會場域間的密切 關係,才能奠定施為的概念基礎,提供最佳的女性身體政治策略; Butler 則是從 Derrida 的「延異」概念(différance)⁷來解讀 Foucault 的身體規訓與其相關技術。兩人所各自要超越的理論限制隱然指向新 的身體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即有效的身體政治不能只顧一端,而是要 結構與歷史兼容並蓄。

本文的結論是:McNay和Butler身體政治的對比,並非二擇一的單選題,而是發掘兩者身體觀理論與實踐的互補性與互見性,McNay/Bourdieu這一組偏好社會結構面向,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從結構中產生變化的發展細節;另一方面,Butler/Foucault這一

注/爭取 vs. 宰制/服從 (investment/domination); (4) 生產性 vs. 消極典範 (generative/negative paradigm) (McNay 2000: 1-6)。

^{7 「}延異」(différance) 一詞隱含兩個動詞——「差異」(differ) 與「defer」(延遲),指涉字詞的意義在時間進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與新義。因此,「延異」顯示文本的意義並非回歸到最初的原始意義,因為所謂的真正意義毋寧是在歷史進展中不斷地被拖延,從而產生更多的歧義,擴展文本的豐富性。

組偏重於主體化的歷史權力分析,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結構如何使 偶然的第二天性成為天經地義。可見兼顧結構與歷史對身分認同的關 鍵作用,才不會淪於決定論與意志自由兩端,身體政治行動立基於分 析女性如何在規訓中產生抵抗,在被社會收編中獲得其自主性,超越 宰制與服從的簡單二元性。以上融綜的理論特點,指向了女性主義身 體觀想要貫徹女性主義要取消抽象的主體性,同時又可以身體為施為 的核心,從而建立有效的身體政治實踐的相關經驗研究的基本方法與 策略。

二、兩種女性主義社會建構的身體觀

(一) McNay 論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之差異

由於 McNay 的思想從早期的 Foucault 研究(1992)轉向近年以Bourdieu 為其研究核心,她針對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差異的對比研究,即彰顯了她的身體觀由 Foucault 轉向 Bourdieu 的重要關鍵。所以 McNay(1999; 2000)列出四個要點去比較分析 Foucault 與Bourdieu 身體觀的差異之處,實則反映了 McNay 本人的身體觀更為貼近 Bourdieu 的社會慣習身體觀。以下將藉由 McNay 的對比分析來彙整出 McNay 身體觀的特色。8

⁸ 雖然 McNay (1999) 所列出的四點差異有利於理解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的特徵,但是只能算是她對兩人的理解與詮釋,至於是否忠於原著,當然具有高度爭議性。比如說將 Foucault 的柔順身體解讀成被動的白板 (tabula rasa),肯定會遭致 Foucault 研究者的反對 (Dudrick, 2005)。作者已專文討論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的相同與差異,受限於篇幅,本文將焦點放在 McNay 和 Butler 各自對 Bourdieu 和 Foucault 的理解與批評上,問題將不在於她們的理解

1.身體的時間性 vs. 無時間性 (temporality/atemporality)

首先,McNay(1999: 101)指出 Foucault 的柔順身體是白板(tabula rasa),基本上是「在被動空白表面上銘刻權力關係」(McNay, 1999: 96),既然身體是不斷重複地被權力雕琢,那麼身體(白板)所呈現的若非權力關係的穩定性,就是從外部的力量來改造身體,身體本身是被動的,缺乏施為的概念,也缺乏時間性的要素(atemporality)(McNay, 1999: 101)。因此,柔順身體僅止於靜態的(static)不斷重複權力關係(McNay, 1999: 102),若是柔順身體能夠轉變,那也只能是外部社會結構產生根本的改變,柔順身體完全缺乏「從內部解體」(decomposition from within)的任何可能性(McNay, 1999: 102)。反之,Bourdieu 社會慣習身體觀強調實踐的時間性,社會慣習集過去、現在與未來於一身,身體是過去(社會、歷史)的產物,但是身體的實踐持續建構未來的社會關係。相對於柔順身體只是重複著既有的權力關係,McNay 認為 Bourdieu 強調實踐的時間性,呈現出身體與社會的關係是動態的(dynamic)與開放的(McNay, 1999: 102)。

以上分析顯示,身體的時間性與無時間性的對比,反映了身體的行動力與重複性的差別,進而指出 Foucault 的柔順身體只是服從與被動的身體,內化了社會規則,無法產生施為。相對的,McNay 主張Bourdieu 的身體慣習是具有施為的身體行動。根據服從(subjection)與施為的對照,McNay 認為如果還是誤將柔順身體與身體慣習看成相似的話,就是嚴重地忽略了兩種身體觀背後的實質差異(McNay, 1999: 100)。

是否忠於原著,而是她們如何從該理解與批評中去發展出對身體觀的見解。

2.前反身性 vs. 反身性 (pre-reflexivity/reflexivity)

McNay 同時指出 Foucault 身體觀經歷理論轉向,從柔性身體到自我技術所講究的美的存在,Foucault 晚期的身體觀蘊涵了主體性概念,強調施為的反身性(reflexivity)與自願性(voluntarity),自我可以自由選擇作用於身體上的技術。反之,McNay 主張 Bourdieu的社會慣習強調社會施為是體現的(embodied)與前反身性的(prereflexive)(McNay, 1999: 102),社會慣習更能彰顯深植於肉身的習慣才是最經久(durable)的信念。McNay 舉親密性為例,說明男性化與女性化已經是深植於肉身的性別結構,身體無意識地長期投注下,很難去質疑與轉變既有的兩性親密關係(McNay, 1999: 103)。

這樣看來,意識的反身性與前反身的身體慣習的對比,應該合理地推論出後者的身體觀完全籠罩在社會決定論下;而 Foucault 所主張的自我管理的自由實踐則預設了自我監督的策略與主體意識的反省,奠定了施為的自由。但是 McNay 並不認為反身性就意味著自由,也並不認為前反身性就代表身體完全被社會決定。事實上正好相反,根據 McNay 的主張,Foucault 從稍早的柔性身體概念背後所蘊涵的決定論立場,轉變成晚期自我技術所蘊涵的自願節制的自由實踐,顯示其身體觀在決定與自由間擺盪(McNay, 1999: 97; 2000: 8-9)。對比起來,McNay 主張 Bourdieu 強調身體不經意識的實踐行動,一方面強調了身體習慣的長久性(durability),但是另一方面更確認長久性不等於不可突變性(immutability)。只要社會的影響力不是絕對與全然封閉的,那麼處於結構與實踐間的身體行動,就會產生整體結構的動態與變化(1999: 101, 103; 2000: 39-40)。

根據 McNay 針對反身性與前反身的對比——也就是主體性與施 為的對比,她進一步指出傳統主體性所預設的身/心二元對立;相對 而言,施為的概念蘊涵了身體,因此,沒有身體的行動是抽象的、不能行動的身體是盲目的。McNay 主張後期 Foucault 的身體觀明顯地蘊涵主體性概念,對照起來,McNay 主張 Bourdieu 的身體實踐始終貫徹了施為的概念。

反身性與前反身的對比,或是主體性與施為的對比,除了用以分析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的差異外,值得一提的是:這組對比還更深入地反映了兩人的身體觀是否始終保持著理論的首尾一貫性。顯然的,後期 Foucault 的身體觀所蘊涵的主體性概念和柔順身體所預設的主體性之死,顯示 Foucault 的身體觀經歷過的轉向。從柔順的身體所預設的身體和性慾主體從屬的四項「主體化模式」(modes of subjectivation)⁹中,顯示的身體特性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被動的身體(白板);後者涉及美的存在或是倫理主體的節制與禁欲,指的是「自願的服從」,在個人的自由、自律與意志的前提下,忽略了身體的社會先決條件。於是,傳統主體性重回歷史舞台(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個人自由是海闊天空的無限可能。反之,McNay 認為Bourdieu 的社會慣習概念所強調的身體施為一貫強調社會的客觀限制,施為在社會場域中的有限身體實踐(McNay, 1999: 113)。

⁹ 四項「主體化模式」分別是:首先,道德主體必須決定是以自己的某些部分做為道德行為的對象,這個部分就做為「道德的本質」(ethical substance) (Foucault, 1985: 26);再者,道德主體必須決定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順應道德規範,所選擇的方式就是「服從模式」(the mode of subjection)(Foucault, 1985: 27);第三,主體在「道德方面所作努力的形式上也有差異」(forms of elaboration)(Foucault, 1985: 27);最後是倫理主體的目的(telos),每個人必須決定當自己實踐道德規範時,是想成為什麼樣的存在方式(Foucault, 1985: 28)。

3.消極典範 vs. 生產典範 (negative paradigm/generative paradigm)

其次, McNay (2000: 1-6) 指出消極典範 (negative paradigm) 和生產典範 (generative paradigm) 這組對比概念,進一步強化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的差異。McNav 認為 Foucault 的身體觀 是消極典範,透過服從(subjection)來建構主體(subject)是超越 自由/決定二元論的必要策略(McNay, 2000: 2), 但是 McNay 認為 Foucault 的身體觀事實上規避了這個策略,或強調柔順身體的被動 性,認為身體只是過往記憶的白板(retention),或強調「主體化模 式」,讓身體消失,「自願服從」預設的個人自由、自律與意志紛紛 現形,儼然回歸傳統主體性下的抽象個人(abstract individual),伴 隨著所有自由行動的可能性。相反的,McNay主張社會慣習是生產 典範,身體不是在白板或消失兩端間擺盪,而是中介於結構與行動, 透過服從來建構身體行動,於是身體無法離開社會的客觀限制,更銘 刻著對計會歷史的客觀記憶,但實踐行動將展現客觀環境的潛能。身 體集過去、現在、未來於一身的特性。「社會慣習是過去出現在現在, 而現在使即將發生的成為可能」("Habitus is that presenc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presence in the present of the forthcoming") (Bourdieu, 2000: 210) •

4.「經營—妥協」vs.「宰制—抵抗」(investment-negotation/domination-resistance)

最後,McNay 根據「經營一妥協」vs.「宰制一抵抗」這組對比,分析 Foucault 與 Bourdieu 身體觀預設的行動主體概念的差異。 McNay 認為 Foucault 的身體政治在決定與自願兩端間擺盪(1999: 97),因此身體不是欠缺了社會施為的概念,就是預設了傳統主體性。於是,Foucault的身體政治落於不是被宰制(domination)就是抵抗(resistance)的二元論中(McNay, 2000: 105)。反之,Bourdieu的身體觀超越宰制/抵抗的二元論,既然施為始終處於社會決定中,那麼身體的經營(investment)與政治的協商才是更有效的身體策略。

最後必需補充的是,McNay 指出的最後一組對比不僅反映了Foucault 與 Bourdieu 對身體政治的差異,同時也大幅強調了身體政治背後所預設的身體與社會的關係。宰制一抵抗反映的身體政治大抵預設了身體和社會的二元對立關係,社會外在於身體,身體受社會影響與教化。身體與社會的二元性可以解釋柔性身體受社會影響的被動性,也說明了當身體反抗時,創造美的存在正在於擺脫社會的宰制與操控,自我自由選擇作用於身體上的技術。相對的,經營一妥協所反映的身體政治超越身體和社會的二元對立關係,社會和身體互為表裡、互為條件。

(二) McNay 的身體觀: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相同與差異

綜上所述,McNay(1999; 2000)藉由上述四項對照分析,透過對 Bourdieu 身體觀的高度肯定,從而也反映了 McNay 身體觀是如何地貼近 Bourdieu 的社會慣習的身體觀。McNay 的身體觀幾乎完全合乎 Bourdieu 社會慣習的四項特點,分別是:首先,身體具有時間的特性,不僅僅只是記憶的白板,不斷重複地累積過去的經驗,同時也因為世界的可能性的體現,身體具有對未來經驗的前瞻性與預期心理(McNay, 2000: 40-41)。身體是集過去、現在、未來於一身的時間性,套用 Bourdieu 的描述是:「社會慣習是過去出現在現在,而現在使即

將發生的成為可能」(Bourdieu, 2000: 210)。

其次,身體大抵都是不經意識的臨場反應,強調身體在特定社會關係中養成的長久習慣,身體實踐不是理性主體的仔細盤算,也不是環境長久制約下所造成的反射動作。雖然並非意識的沙盤推演,身體的臨場反應表現了對世界可能性最直接與合理的回應。可見身體的前反身性(pre-reflexivity)除了顯示環境長久與深遠的制約外,也凸顯了身體的能動性與生產性(McNay, 2000: 41)。

第三,身體的實踐可從生產典範來掌握,超越傳統自由與決定間的二元論,是在長久的社會制約中表現有限的自由。生產典範顯示,一方面是作用於身體上長久與深遠的社會權力關係性(durability),另一方面更強調社會與歷史的長久性不等於不可變性(immutability),社會的影響力不可能是絕對與封閉的,此外身體是處於結構與行動間的實踐,是動態與可變的(McNay, 1999: 101, 103; 2000: 39-40)。

最後,McNay認為既然身體自由實踐的先決條件是長久的社會制約,那麼傳統所使用的宰制與抵抗的二分法,勢必無法適用於後資本主義社會中複雜的權力關係。要分析身體政治所產生的社會轉變,絕對不能忽略社會與歷史制約獨特性,從中分析權力關係長期在身體上的經營(investment),然後身體的能動性如何在既定的權力關係中妥協(negotiation)其相對的利益與權力(McNay, 1999: 105; 2000: 58)。故身體政治是 Bourdieu 所謂的「規範的自由」(regulated liberty),從社會制約中顯現自由的身體策略,從身體所在的社會空間與其相對位置中,來觀察身體行動的水平、向上或向下流動,以及客觀的阻力或助力(McNay, 2000: 58)。

雖然深受 Bourdieu 身體觀的影響, McNay (2000: 52-57) 依然 從性別的角度來超越前者理論中的不足之處,指出 Bourdieu 雖然強

調社會慣習和場域的重要相關性,¹⁰ 卻忽略了將其應用在性別認同的 分析上。換言之,McNay 認為由於 Bourdieu 在性別認同的慣習上忽略了場域概念,並無深入分析各個社會場域中權力關係的特性與差異性,也就無法掌握主流的性別慣習(男主外、女主內)進入不同的場域中所產生的衝突與轉變,反而錯誤地主張雄性統治下的性別慣習歷經農業時代到後資本主義社會,仍然長久不變。¹¹ 因此,Bourdieu(2001)對女性社會慣習的分析只是顯露出女性社會慣習充其量只是雄性統治的共犯結構,根本缺乏抵抗的政治效力(McNay, 2000:51)。

總結以上分析, McNay 認為唯有充分掌握社會慣習與社會場域

¹⁰ Bourdieu 談身體行動處處不離社會慣習與社會場域(field)。以球賽的場地來進行類比,場域就如同不同的球賽,不同的賭注與輪贏就好比是不同類型的資本(經濟、教育、社會、象徵);進入賽局就如同是社會成員的實踐,身在賽局(場域)中,肯定賽局的重要性,經營(interest,包括利益、興趣、投注心力);球員的「遊戲感」(the sense of the game)或是「臨場感」就如同實踐的社會慣習,表現為各類運動或是才藝好手的絕佳技藝(virtuosi),沒有先天內建的規則,也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是熟練的技巧、最恰當的臨場反應,雖然不是理性深思熟慮的結果,卻一樣是再合理不過的唯一正確做法(Bourdieu, 1998: 76)。

¹¹ Bourdieu(2001)在《雄性統治》一書中對女性社會慣習的深入刻劃只是更深入地掌握女性是男性中心共犯的細節。凡根據社會慣習的女性實踐,意圖改變現有的狀態,都被 Bourdieu 分析成「弱者的武器是弱武器」(the weapons of the weak are always weak weapons)(Bourdieu, 2001: 32)。如果女性能夠抵拒「三高」迷思,將導致該女性不可避免的自我矮化之感(Bourdieu, 2001: 36)。女性進入男性工作,表示或是相對的男性大量流出,或是社會普遍將該行業視為降級;反之,當男性進入以女性為主的行業,往往造成該行業形象的提昇(Bourdieu, 2001: 60)。至此,社會慣習概念只是社會結構的再製與延續,缺乏實踐面向的社會改革實踐力。於是女性社會慣習充其量只是「柔順的身體」,是體現的從屬、被觀看的存在,持續不斷地在身體上進行女性化(femininity)的經營,將身體慣習的文化資本轉變成男性中心所認可的象徵資本。

間的密切關係,才能奠定施為的概念基礎,提供最佳的女性身體政治 策略。要充分掌握慣習與場域間的關係,就得超越各種二分法的理論 窠臼,轉向以雙邊對話與辯證模式來理解場域與慣習之複雜關係。

場域與場域間有著不同的層次(McNay, 2000: 60),層次與層次之間的關係(經濟的、文化的、象徵的,政治的等等)有以下三個複雜面向,即(1)下層是上層的組成要件;(2)各層本身的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3)上層所顯現的性質(emergent property)不能還原到下一層。複雜的社會系統並不只是單方向的微觀決定論(micro-determinism),而是多方決定的互為條件的關係(overdetermination)(McNay, 2000: 59)。因此即使身體被社會關係所決定,但是身體的顯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不能簡單地還原到社會關係中,身體擁有相對的自主性,可以反過來影響既有的社會關係。此外,隨著場域的差異,身體也呈現相應的特質,場域間的權力差異顯示,女性身體政治不是平等與均衡的發展,所以某種有效的政治抵抗(如都會區的同志運動)不見得適用於不同場域的人(非都會區的勞動階層)。所以不能忽視其中社會與歷史的獨特性,簡單來說必需著眼於身體所在的權力關係中檢視其相對的政治策略才是(McNay, 2000: 51)。

以上分析顯示,McNay 身體觀一方面深受 Bourdieu 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也超越了前者,主張社經文化皆弱的弱勢者仍然可以進行的有效的身體行動策略,挑戰 Bourdieu 所謂的「弱者的武器是弱武器」的論斷(Bourdieu, 2001: 32)。

(三) Butler 的身體觀

1.Butler 對 Foucault 身體觀的批評

以上討論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對比中,只是稍微地觸及了身體的特色,除了 McNay 一再批評 Foucault 的身體是白板外,沒有更深入地探討什麼是身體的問題。反之,Butler (1989; 1993; 2004) 的身體觀雖然深受 Foucault 身體觀的影響,但是卻能從批評Foucault 身體觀的理論矛盾中,進而提出其身體觀的獨特見解。

基本上, Bulter 和 McNay 都將 Foucault 身體觀解讀成被書寫與 銘刻的白板,身體銘刻(bodily inscription)預設了身體是先於文化 與社會的建構,因此與 Foucault 主張身體是社會建構的結果而非先於 歷史作用的本體存在,顯然是自相矛盾的主張(Butler, 1989: 602)。 Butler 認為 Foucault 身體觀的矛盾充斥於性史與權力的論述中,她指 出 Foucault 一方面藉由批評 Freud 和 Nietzsche, 兩人都預設了身體是 先於話語的本體存在, Freud 所謂的被壓迫的性已經預設了先在的慾 望,根據 Foucault 的分析,被壓迫的性是結合醫療、刑罰、教育等權 力機制所產生的效果,並不存在本然如此的性(Butler, 1989: 604)。 Butler 認為即使 Foucault 極力要避免落入 Freud 和 Nietzsche 的理論困 境,但是將歷史與文化的權力機制理解成是身體銘刻,就不得不預設 了身體是歷史之外、權力之外與話語之外的本體存有。此外,Butler 認為, Foucault 一方面預設了身體不斷地被歷史與文化書寫所圍剿, 破壞與壓迫(Butler, 1989: 603),另一方面也主張先於話語的身體正 是抵禦歷史與文化書寫的根源(Butler, 1989: 607)。Drudric (2005: 226) 將 Butler 立論 Foucault 自相矛盾的立場,整理成如下的論證, 值得參考: 12

- (1) Foucault 主張身體是由文化與論述的脈絡與權力統治所構成;
- (2) Foucault 因而主張沒有獨立於權力統治之外的物質性身體;
- (3) Foucault 主張從銘刻模式來理解文化建構過程;
- (4) Foucault 因而主張身體是外在於銘刻的存在狀態;
- (5) 論述/權力的統治構成銘刻之所在;
- (6) 因此,(2)、(4) 是不一致的;
- (7) 因此,(1)、(3) 是不一致的;
- (8) 所以,根據(1)、(3), Foucault 的身體觀因此是不一致的。

Foucault 身體觀不僅是理論上產生矛盾性,也勢必造成身體政治的實踐困境,因為如果身體解放是訴諸於回到歷史與文化作用之前的純粹身體,那麼無疑是虛幻的妄想。可見,Bulter 必須在身體的社會建構論中避免重蹈 Foucault 身體觀的自相矛盾。因此如何擺脫身體的本質主義,從歷史與文化建構中產生與形成身體的物質性,從而提出有效的身體行動策略,將是 Bulter 身體觀的重點。

2.身體的物質性、性別展演與施為

首先,秉持著後結構主義的理路(Butler, 1993: 12),Butler不從身體的本質面來探討不變的身體特質。於是,將身體看成是先在

¹² Dudrick(2005)為文的目的是要批評 Butler(1989)對 Foucault 身體觀的解讀 是錯誤的,從而主張應該如何正確解讀 Foucault。受限於篇幅,本文不擬進入 相關的細節,惟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討論的 McNay 和 Butler 都對 Bourdieu 和 Foucault 進行理解與批評,問題不在於她們的理解是否忠於原著,而是她們 如何從該理解與批評中去發展出對身體觀的見解,這才是本文的焦點。

的(the given)是忽略了歷史與社會的作用,誤將歷史長期作用的成果視為本質存在與語言的統一指涉。當然,批判身體的本質論勢必合理地導向某種身體的建構論,¹³ 但是 Butler 認為女性主義建構論對性/別區分(sex/gender distinction)的探討(Butler, 1993: 4-5),或是在生理差異上賦予社會的性別,或是強調社會性別來取代性,性只是虛構與幻象(1993: 5)。於是 Butler 主張超越本質論與(語言)建構論,認為身體既不是先在的,也不僅是語言所建構。相對的,身體既是物質的,也是語言的產物。Butler 以身體的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of body)來立論身體是沒有本質性的物質,並且主張語言可以建構物質的身體。

根據 Butler 的解釋,身體的物質性指的是歷史與社會長期權力關係作用的結果,所以身體的物質是物質化的結果,而非相反(Butler, 1993: 9)。因此看似先在的事物都有歷史軌跡可尋,如果忽略了物質的歷史,誤將物質視為身體觀的理論起點,等於是忽略長期歷史的沉積作用,將沉積物質視為永恆不變與理所當然的自然物。和唯物論者一樣,Butler 也強調身體不只是語言的虛構,身體當然有其物質基礎,但也和語言建構論者一樣,Butler 主張述說身體物質性的歷史系譜也從而建構身體,而不是從外部與從旁理解身體的。以上顯示Butler 身體物質性的概念意在超越(本質)唯物論與(語言)唯心論二端(Butler, 1993: 12)。

所以身體的物質性是語言與物質的混合物(Butler, 1993: 10)。 Butler 解釋語言與物質的關係是「互相交織、在互相依賴中交錯、 不能夠互相還原、也不能夠駕馭對方、不能等而視之、卻也不是彼

¹³ 受限於篇幅,本文不擬處理建構論的科學哲學議題,僅針對身體和建構論的關係來討論。至於建構論的基本討論可參考 Hacking (1999)。

此敵對。」(Butler, 1993: 69)語言與物質的複雜關係顯示,語言不只是抽象的能指(signifier),身體也不只是在語言外的實質所指(signified),對物質性的指涉必然伴隨著能指與所指間的意義化過程(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Butler, 1993: 68),而意義化過程也總是透過物質媒介來呈現。語言與物質的交錯顯示了Butler書名的雙關性,《重要的身體》(bodies that matter),「重要」(to matter)有「物質化」(to materialize)的意義,也是「意義」之意(to mean)(Butler, 1993: 32)。於是,「重要的身體」也就是意味著身體的重要意義在於其物質化過程。

具體而言,身體的物質性是從性/別/性欲傾向/身分認同方面來著眼。和一般從先天與後天來談性/別區分有別的是,Butler和 Foucault 一樣,主張性是(異性戀)文化與社會的性規範,是過往歷史的規律與偶然實踐所形成的權威與制約(Butler, 1993: 108),在異性戀的規範下,相關的法則、儀式與禁忌不斷來建構身分認同。根據 Butler,性欲傾向與身分認同是個人不斷重複(iteration)的引用(citation)異性戀的相關法則,是「性別展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的結果(Butler, 1993: 12, 95)。¹⁴「性別展演」不是主體自願採取的身分認同,而是強調文化制約下,如何透過命名、稱謂、重複的習慣與成文的慣例(1993: 121-124),在不自覺的身分認同中從而建構性欲主體(1993: 15)。「性別展演」的概念顯示的不是主體如何基於其自主性所採取的身分認同,而是承襲 Foucault 超越自

^{14 &}quot;performativity"或是 "performance" 一般常見的翻譯是「展演性」或是「展演」, 筆者亦將遵循此翻譯, 但是呼籲不要對「展演」一詞望文生義, 產生誤導。依照 Butler 的解釋,「展演」並不是強調主體自願的行動與劇場的戲劇行為, 而是取其重複引用現行法規的意義。

由與決定的二元論,凸顯從制約(異性戀的規範)中,建構欲望的主體。

和 Foucault 一樣,Butler 從權力關係一話語與非話語(機構、制度)來解釋文化正當性的偶然性與獨斷性。根據 Butler,性壓迫只是刑罰權力中的一環(Butler, 1993: 22),法則權威的重複產生合於(異性戀)規範的正常的性行為,同時也產生不合於規範的所謂低下(abjected)、非人與被排斥的變態性行為(1993: 22)。可見,規範外的他者和文化中心的主體一樣,都是來自刑罰權力的重複與援引法則。刑罰不只是建構主體性,它也透過否定作用而在那些合格的人類、不合格的非人類和人類根本無法想像的他者間產生高度的差異性("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is a differential operation that produces the more and the less" the human, "the inhuman, and the humanly unthinkable")(1993: 8)。

既然「性別展演」的概念企圖徹底摒棄主體的自願性,那麼Butler 也和 Foucault 一樣,必須面對如何批判主體的問題,亦即:如何從制約中產生施為,進行社會批判,干擾與改變既有的文化規範?依從性壓迫的脈絡的話,問題就轉變成:如何改變異性戀的法則,採取不同的身分而不會遭受懲罰?針對此一重要問題,Butler 基本上從(刑罰)權力的特性來回應,刑罰制約並建構(性欲)主體,但是同時也讓建構的主體產生能動性。換句話說,能夠對文化規範產生批判的正是那些被規範所制約的主體。Butler 將(刑罰)權力既制約(constrain)又能動(enable)的雙重特性描述為「主體化的矛盾」(the paradox of subjectivation)(Butler, 1993: 15),此矛盾在於:能夠有效抵抗社會規範的主體,其能動性是來自於該規範。

「主體化的矛盾」同時也反映社會規範的內部矛盾,一方面是社

會規範雖然通過其權力機構(如家庭、學校、軍隊、工廠、醫院等等)的稱謂與命名機制,重複地建構身分認同,進而持久地延續了異性戀規範的穩定與持續性;另一方面,在「性別展演」的過程中呈現(異性戀)身分認同只能是不斷地趨近,終究無法企及的理想,成為真正的男人與成為真正的女人都是對理想(型)的模仿(Butler, 1993: 125)。從異性戀的正當性中所產生的被排斥的他者,如酷兒(queer)與扮裝者(drag),根據 Butler 的分析,不能只是簡單地看成是對異性戀的模仿,因為將酷兒與扮裝者視為二度模仿預設了先在的性別存在,但是異性戀已是對該性別理想的模仿——所謂天經地義的異性戀,究其根本,並無所謂的真正的性別。

可見有效的性別批判不是預設了先於話語的身體抵抗,而是從「性別展演」的機制中去掌握「展演的矛盾性」(the ambivalence of the performance)(Butler, 1993: 137),亦即看似被異性戀社會規範所收編的性別扮裝,從那些競賽中爭相表現比女人還要女人(男扮女)、比男人還要男人(女扮男)的身分認同中,批判地指向理所當然的異性戀,挑戰了社會規範的不變性與普遍性。「展演的矛盾性」顯示權力關係的底蘊是動態與歷史的,在(法則)不斷重複與引用的過程中,持續地產生各種差異性,正常、不正常與無法想像的非人類,社會規範不可能屹立不搖地進行全面的宰制,社會規範雖然具有持續性,但是也必然伴隨著權力自身的不穩定性(1993: 8-9, 118-119)。於是在堅決反對人道主義下(1993: 124),政治的能動性不需要預設傳統的主體性,也不需要從主體的自願性與自由意志來立論。在社會制約中仍然可以產生施為,而有效的政治批判同時處於被收編與抵抗的雙重張力中(1993: 128)。

三、McNay vs. Butler:身體觀的論戰

(一) Butler 對 Bourdieu 的批評

由於 Butler 曾專文討論 Bourdieu 的社會慣習和語言「展演」 (performativity)的關係(1997: 127-163),可以清楚地掌握兩人身體 觀的同異,此段將著重於分析 Butler 對 Bourdieu 社會慣習的批判。

首先,Butler 認為 Bourdieu 社會慣習能夠清楚地解釋社會規範和法則是體現的行動(embodied activity),「法則是非意向與非思量的肉體化」(non-intentional and non-deliberate incorporation of norms)(Butler, 1997: 142)。法則並不是外在強加於身體的規範,而是社會的規律性所建構的身體性向與喜好,從而身體的性向實踐也成為社會認知的基礎(1997: 154)。此外,Butler 也認為社會慣習概念能夠顯示身體既是物質又是語言的雙重性,身體的體態、穿著、風格與品味都是意義的符碼,身體的實踐也就是有效的行動,如同「言說行動」(the speech act)的概念顯示:「字詞就是行動」(the word becomes the deed)(如宗教的洗禮、證婚儀式與逮捕嫌犯等)(Butler, 1997: 141, 146)。所以將主體哲學意義下的言說行動取代身體為主的語言行動,產生了Butler和Bourdieu都重視到的「身體在說話」的重要概念(body that speaks)(Butler, 1997: 155)。但是說話和身體存在何種關係?身體如何說?身體和沉默的關係?身體如何抗議?回答這些問題的不同,正是Butler和Bourdieu的重要分歧。

既然言說行動是身體行動,必然會涉及行動的力量,或是 Butler 所謂的「展演的力量」(the force of the performative)(Butler, 1997: 141)。Butler 認為 Bourdieu 從既有的社會權力關係與既定的權威脈

絡來解釋發言人的言說行動力,一方面杜絕了社會邊緣人的反動性,另一方面也只是保守地鞏固既存的社會權力關係(1997: 147, 156)。Butler 進一步解釋為何 Bourdieu 的身體言說行動無法有效地反抗社會霸權,其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展演」的運作機制。「展演」是重複與援引(法令、書寫、記號),「規範」與「言說」等的重複性不再於強調社會權力關係的靜態與封閉,而是強調「規範」與「言說」的「解構」(deconstruction)和「分裂」(a break)(1997: 147),因為規範與言說雖然具有持續性,但是也必然伴隨著權力自身的不穩定性(1997: 118-119)。

透過對「展演力量」的兩種對比,或傾向「社會」結構的一端,或傾向「文字」結構的一端,顯示了Butler從Derrida的「延異」概念(différance)來批評Bourdieu的社會決定論,並且也指出她如何從Derrida的解構概念來解決Foucault所留下的政治行動如何可能的問題。根據Butler的分析,重複雖然產生規範、紀律與文化意義,但是重複的歷史運作機制中必然伴隨著意義的不穩定性與意義的轉化,因為本然與固有的意義系統並不存於歷史之外。規範、紀律與文化意義的持續重複,也就如同當美國南方的黑人一直重複遵行種族隔離規定不得坐上公車前排座位的規定。當Rosa Parks公然坐上公車的前排坐位,顯示對重複規訓的斷裂與轉化(Butler, 1997: 147),15 她的政治行動顯示她也擁有社會之前拒絕授予的權利。可見身體言說行動可以反抗社會霸權,或是改變原來的語境,或是擴大原本用語的意義

¹⁵ Butler 引用此一著名的黑人人權事件來說明展演的社會顛覆性與解構性(Butler, 1997: 147)。但是 Lovell (2003)就是針對 Butler 所引用的這個例子,專文批評 Butler 忽略該政治事件並非個人的行動,而是集體的社會行動。本文第二部分將進一步地探討 Lovell 的批評。

(如「正義」、「平等」、「自由」)(Butler, 1997: 160),推翻既有的正 當性,開放了未來的可能性。

雖然 Butler 從解構的角度來強調社會轉變的政治行動,但是 Butler 也同意 Bourdieu 對解構的批評,並不是所有的說話行動都具 有反動性,比如髒話和三字經,被罵的人很難接受這些稱謂,然後 改變其負面的意義,成為有效的反動力量(Butler, 1997: 161)。所以 Butler 雖然主張言說行動的反動性,但是她並沒有忽略施為的社會制 約脈絡,一方面強調身體的行動是語言與社會的交錯,另一方面則是 主張凡是有效的政治行動必然處於既被收編又能夠抵抗的雙重張力中 (1997: 128)。就像(男、女)同志接受了醜化的稱呼,並且讓污名 擺脫了原來的權威,發展其新的意義,原是傷人的言詞,可以成為抗 暴的工具(1997: 163)。周華山(2000: 99-115)就從女性講髒話的 經驗研究中,立論女人講髒話所產生的解放力量,以及擺脫性別刻板 印象。

(二) McNav 對 Butler 身體觀的褒貶

上文討論 McNav 身體觀所羅列的四項特點,包括:時間性(vs. 無時間性)、前反身性(vs. 反身性)、生產典範(vs. 消極典範)、經 營/妥協的身體政治(vs. 宰制/服從的身體政治),與場域與慣習 之複雜關係,是 McNay 用以批評 Butler 身體觀的參照點,以下將討 論 McNay 如何捍衛 Bourdieu 之身體觀。

第一,就身體的時間性而言,McNay 認為 Butler 的「性別展演」 (gender performance)的概念具有「雙重時間性」(double historicity) (2000: 41),身體體現了既有的規範(retention),同時也不斷地從

「以身作則」中,或複現或轉變既有的規範(pretention)。可見身體 不是記憶的白板,機械式地打印上性別差異的記號。反之,身體是在 不斷重複與累積性別規範中,同時也能夠從身體的仿擬中,凸顯性別 規範的內在偶然性與獨斷性,進而採取不同的身分認同,挑戰刻板 的性別印象。所以,就身體的「展演」概念而言, McNav 認為 Butler 成功地擺脫了Foucault柔順身體的理論缺點,身體不是缺乏發展的白 板,而是動態的重複與改變身體的規範。

第二,就身體的不經意(前反身性)而言,McNay認為 Butler 「性別展演」的概念和「社會慣習」概念都不是深思熟慮的意識行為, 不是主體自願選擇其性取向,而是在既有的性規範下,身體不自覺 地養成的性向習慣,從而產生了身分認同,形成欲望主體 (McNay, 2000: 43-44)。如此一來, Butler 的性別展演概念也致力於挑戰傳統 哲學的主體性概念,主體不再是行動理論的起點,而是物質化過程中 的結果,是從服從(subjection)中建構主體(subject)。

從以上兩點身體觀的特色,顯示出 Butler 的性別展演和 Bourdieu 的社會慣習概念有著某種程度的近似性,兩人都正視社會(而非心 理)的深層制約。但是 McNay 認為兩者的近似點也僅止於此,如 果更進一步去分析, Butler 和 Bourdieu 有著無法消弭的根本歧見 (McNay, 2000: 40, 45), 這些差異見於後續幾點說明。

第三,就身體的生產典範而言,McNay 認為雖然 Butler 的性別 展演強調時間性與前反身性,亦即:制約中的身體仍然具有能動性, 習慣的身體仍然能夠改變,但是 Butler 身體觀的能動性只是從象徵 (語言、符號)結構的不確定性、偶然性與不穩定性的大前提下推論 出「施為本身是不確定的象徵結構」(McNay, 2000: 45),明顯地忽 略了身體實踐的計會與歷史的物質基礎,亦即 Bourdieu 所謂的計會

場域的概念。McNav (2000: 61) 認為除非 Butler 能夠釐清文化 (象 徵)與物質兩層面,淮而從特定的計會場域與其相應的權力關係中去 分析意義的不確定性與轉化,否則性別展演的施為只能是抽象的行動 者,只重視主體化過程中話語論述的優先性與不穩定性(2000:47), 而忽略產生意義活動所在的場域中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權力的相對位 置,也忽略了探討施為在場域中的計會實踐(2000:59)。

第四,就身體政治的有效策略而言,Butler 認為「展演」的象徵 機制才能避免 Bourdieu 所分析的象徵暴力的弔詭, 16 Butler 淮一步指 出重複與援引(法令、書寫、記號)的重複性不在於強調計會權力關 係的靜態與封閉,17 而是著重於強調「規範」與「言說」的不確定性, 在重複中產生「解構」(deconstruction)和「分裂」(a break)(Butler, 1997: 147)。針對 Butler 對 Bourdieu 理論中決定論傾向的批評論點, McNav 也抱持肯定的態度。只是 McNav 認為 Butler 所採取的「展演」 策略終究無法扭轉社會慣習的決定論傾向,因為「展演」的機制本意

^{16「}象徵暴力」概念泛指統治者的價值體系與分類高低範疇作用於被統治者上, 對被統治者形成排斥與貶抑的實質作用(Bourdieu, 2000: 185-186)。以雄性統 治的象徵暴力而言,男性的價值觀不斷製造與再造的過程,而且這樣的過程不 是通過意識的作用,而是直接作用於身體的習慣與性向上,使得被統治者以統 治者的價值觀為自己的內在價值。女性善於問價、討價還價和要折扣等行為被 看成是小鼻子、小眼睛的瑣碎行當,是豪邁、氣派的大格局男性所不願與不屑 為。而女性也因持續從事這些男性所不願做的事,也認為這些小事讓女人來做 就好, 讓男人全心全意操心家國大事就好(Bourdieu, 2001: 33), 於是女人的 身體慣習才是鞏固雄性統治的穩定基礎。

¹⁷ Butler 認為 Bourdieu「象徵暴力」預設了社會權力關係的靜態與封閉性,因為 根據 Bourdieu 的分析,象徵暴力並非外力的脅迫,也不是共識下的社會契約, 而是在無意識下以身體為媒介,落實於身體所產生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既然象 徵暴力凸顯了統治者的價值體系是在無意識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然)銘刻 於身體上,既微妙又難於辨認的權力運作,那麼有效的身體政治便難於進行。

是在於強調規範的不確定性,卻也嚴重的忽略了過往的沉積力量,看 似具有變化性的重複實踐,實際上可能只是因循著宰制力量,缺乏社 會改變與解構的政治顛覆性(McNay, 2000: 45)。此外,「展演」概 念強調象徵結構的優先性,忽略了社會與歷史的物質條件,於是在展 演機制下的身分認同只具有普遍性,無法從中區分哪些「展演」可以 產生改變,哪些「展演」只是被規範所收編(McNay, 2000: 46)。

就積極面而言, Butler 的政治行動強調社會邊緣者的解構與顛 覆性,那些被規範所排斥的「低賤者」(the abjected)的仿擬與挑 戰,是挑戰社會權力關係的靜態與封閉的重要關鍵。但是,McNay 認為 Butler 所提出的政治行動可能性還是落入正常/不正常、規範 /否定的二分法中。解釋社會轉變的因素仍然是從規範與排斥的對 立,而不是從規範內來探討自由的實踐(regulated liberty)(McNay, 2000: 58)。據此,McNay 認為 Bultler 的身體政治仍然無法擺脫(主 人)宰制與(奴隸)抵抗的概念架構(2000:45),轉而從身體所經 營 (investment) 的特定場域中,如何去妥協 (negotiation) 相對的可 資累積的資本 (McNay 1999: 105; 2000: 58)。

第五,從場域與慣習之複雜關係來看,Butler 批評 Bourdieu 的 社會慣習仍然落入(物質)底層與(象徵)上層的二分法中(base/ super structure)(Butler, 1997),於是說話的力量還原於說話的社會 位置,忽略了話語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社會規範本身就是話語展演所 建構。針對話語與物質間存在何種複雜關係,是 Butler 和 McNav 兩 人間的根本歧見。McNay(2000: 60)批評 Butler 對社會權力關係的 分析,雖然一再強調文化與物質間的交互作用,終究只是凸顯文化與 抽象的意義層面。於是 Butler 從象徵意義 (signification) 來涵蓋社會 權力運作,也從重新賦予意義 (re-signification) 來顯示社會的轉變。

但是, McNay 批評, 如果不從特定場域中的社經脈絡去深入理解社 會的複雜性,重新賦予意義可能只是表面的效果,無法對深層的社會 結構造成任何影響(McNay, 2000: 62)。

可見就話語與物質的複雜性而言,McNay 在某種程度上主張(物 質) 底層與(象徵)上層的二分法,同時也強調應該釐清物質層次與 象徵層次的區別(McNay, 2000: 60)。但是, McNay 主張, 重視物質 底層並不代表支持物質還原論(2000:61),而是深入剖析複雜系統 的脈絡,如層次、顯現性質、多方決定、整體不等於部分的總合,才 能實質地理解施為的個別性與其社會實踐,如此才不會把某種層面的 改變,誤為根本鬆動了既有的計會結構。¹⁸

四、McNay 和 Butler 的女性主義身體政治: 服從與抵抗的矛盾性

總結以上分析, McNay 和 Butler 身體觀的對比就不僅僅只是 反映了各自對 Foucault 和 Bourdieu 身體觀的理論偏好。從兩人試 圖超越身體觀的理論限制中,已經浮現出新的身體政治的可能性。 McNay/Bourdieu 這一組偏好社會結構面向,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 如何從結構中產生變化的發展細節;反之,Butler/Foucault這一組偏 重於主體化的歷史權力分析,因而必須要進一步探討結構如何使偶然

¹⁸ 比如資本主義社會女性的經濟獨立,伴隨的是婦女大量投入服務業(空服員、 化妝品小姐等等),其工作性質所需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work)(McNay, 2000: 41; Hochschild, 1983; 藍佩嘉, 1998), 仍然是婦女傳統所要求的體貼與 犧牲的特質,所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女人要求獨立的身分認同和傳統以 社群為重的無我,複雜的衝突關係並存於當代性別結構中。

的第二天性成為天經地義的自然如此。可見兼顧結構與歷史對身分認 同的關鍵作用,才不會淪於決定論與意志自由兩端,身體政治行動必 須遊走於中間,保持著高度的危險平衡。

不約而同,兩人都強調政治行動的矛盾性,Butler強調「展演 的矛盾性」(the ambivalence of the performance)(Butler, 1993: 137), McNay 主張「規範的自由」(regulated liberty)(McNay, 2000: 58)。 總而言之,「展演的矛盾性」與「規範的自由」非常神似,都是主張 鮮有純粹的抵抗,也少有完全的服從,所以應該著眼於抵抗與服從中 的矛盾性,探討收編與抵抗的雙重張力中所展現的政治策略,才能超 越宰制與服從的簡單二元對立。兩人的根本共識劃下女性主義身體觀 的分水嶺,告誡相關研究者拋棄各種身心對立二元論,轉而從體現 (embodiment) 概念來強調身心交織、主客並存、物質與語言同在, 服從中產生抵抗。

所以,在共同的認知下,兩人身體政治的主要爭論點在於應該 從何種角度來分析政治行動的矛盾性, Butler 選擇了以語言結構為 主的象徵系統來進行分析,意義化(signification)和重新一意義化 (re-signification)的過程、命名與重新命名、意義的約成(convention) 與轉變;相對的,McNay選擇了以物質(社會、經濟、歷史、政治) 為主的社會結構來進行分析,從場域與社會慣習的長久性(durable) 與不可變性(immutable),顯示收編與抵抗的雙重張力,長久的身 體慣習在不同的場域中所產生的新身分認同。可見雖然兩人都強調物 質與語言並在,但是因為理論優先性有別,也就形成了壁壘分明的 差異:Butler 的話語優先 (discourse) vs. McNay 的物質 (非一話語 (non-discourse)) 優先。

McNay分析所重視的複雜社會物質關係,也是另一位深受

Bourdieu 影響的女性主義者 T. Lovell 的基本論點。Lovell (2003) 批 評 Butler 所舉的 Rosa Parks 事件,由於 Butler 並未看清歷史與社會 的特殊脈絡與複雜的權力角力,把集體與眾人所共同賦予的權力, 簡單地看成是 Rosa Parks 自身的權威(she endowed a certain authority on the act) (Butler, 1997: 141), 公然挑戰五〇年代美國南方各州的 種族隔離規定,推翻既有權威的正當性(1997: 147)。Lovell 指出 Parks 並非第一個先例,同年稍早已經陸續有 15 歲的 Claudette Colvin 和 Mary Louise Smith 因為違背規定而被逮補。如果按照 Butler 的分 析,這兩位的行動更應構成反抗運動的先趨,但是 Butler 為何獨鍾 Parks?

根據 Lovell 的批評,僅從「說話行動」與象徵系統無法區分哪 些行動構成反動,哪些行動不構成反動。要區別 Parks 和之前的兩個 行動的不同,就得從廣大的歷史、計會、法律(州法與聯邦法的對 峙)與黑人民權運動的脈絡來分析。所以 Parks 並非黑人民權運動的 發端,而是已經行之多年的黑人人權團體,願意賦予 Parks 代表性地 位,¹⁹ 而且在黑人男權的擴張下,身為黑人女人、又非牧師的 Parks, 一直和黑人人權運動格格不入。所以如果掌握了充分的歷史與社會的 細節,就不會無限上綱 Parks 的重要性,更不會誤將歷史集體行動中 所匯聚而成的顯現性質看成是個人石破天驚的政治行動。

雖然 McNay 的分析更能掌握社會關係複雜性的內涵,但是這 並不意味著該理論優勢無懈可擊,並且能夠完全取代 Butler 的展演 概念。仔細推敲起來,McNay的身體政治分析中,大抵是理論的闡 述,少有具體的經驗研究,尤其是涉及社會弱勢者(經濟、教育、社

¹⁹ 本文所根據的是Lovell的會議發表論文,有與趣者可參考其正式發表的論文 (Lovell. 2003) •

會等)如何展現所謂「規範的自由」,或是研究這些社會邊緣人如 何在具體的場域中表現政治行動的矛盾性——在社會規範中的經營 (invest) 與妥協 (negotiate) 安身之所。由於缺乏從現實的社會脈絡 來落實相關的理論,McNay所一再強調的社會慣習與場域的交互作 用,就容易陷入主流價值觀所活躍的場域與其相應的社會慣習,再製 既有權力的象徵暴力。如此一來, McNay 一心想從社會慣習與場域 的連動性來替 Bourdieu 理論的計會決定論指控解套,恐怕是力有未 逮。

深入分析的話,McNay 和 Butler 都強調政治行動的矛盾性,兩 人的主要分歧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政治行動的矛盾性,可見兩者 的理論必然可以互相增益,截長補短,而非互有輸贏的非此即彼。 McNay 必須要從社會(經濟、教育、社會等)弱勢者切入,面對 Bourdieu「象徵暴力」的理論與實踐困境,而具體展現弱勢者「規範 的自由」的描述必須從柔順身體的「展演性」下手,從而分析女性如 何在規訓中產生抵抗,在被計會收編中獲得其自主性,超越室制與服 從的簡單二元性,進行經營與妥協的身體行動策略。

McNay 和 Butler 兩理論所共通的政治行動的矛盾性,指向另一 條折衷與協調的路徑,亦即結合 Butler 的「低賤者」(abjected)與 被排斥的社會邊緣人的「展演的矛盾性」(Butler, 1993: 22),以及 McNav 強調社會慣習與場域的複雜交互作用,分析「低賤者」在 其社會場域(與其他場域間)中所進行的經營與妥協的身體行動策 略。這樣的象徵鬥爭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身體觀相關經驗研究的基本方 法,採取這種方法的相關經驗研究,非常值得期待。以下將從 Lovell (2003)和 Skeggs (1997; 2003)的相關經驗研究中,一窺此一兼容 並蓄的方法所提供的寶貴分析。

和 McNay 一樣,Lovell 和 Skeggs 兩人都極力主張社會物質關係的複雜性(Skeggs, 1997: 158),也都砲口一致地批評 Butler 的展演概念所蘊涵的社會改變是那些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主義者賣弄聰明的文字遊戲。在批評 Butler 之同時,Lovell 和 Skeggs 也並非全然地倒向馬克思唯物論的傳統。所以和 McNay 不同的是,Lovell 和 Skeggs 都進一步批評 Bourdieu 理論的限制。Lovell(2003)指出 Bourdieu 的象徵鬥爭只限於擁有社會與象徵資本者,忽略了社會弱勢的服從的矛盾性(a submissive habitus may cover resentment and hostility that may be available for political mobilization)(Lovell, 2003: 9-10)。根據 Lovell 的分析,Bourdieu 的象徵統治低估了「服從的矛盾性」;反之,Butler 的展演的不穩定性又高估社會弱勢者的行動力。在過與不及之間,Lovell 和 Skeggs 對服從的矛盾性的分析都指向一種折衷與協調的立場,亦即結合 Butler 的「低賤者」與被排斥的社會邊緣人的「展演的矛盾性」(Butler, 1993: 22),以及 Bourdieu 象徵鬥爭概念,分析「低賤者」在其社會場域(與其他場域間)的象徵鬥爭。

Skeggs (1997) 分析英國西北部 83 位白人女性工人階級,從她們選修當地學院開設的「家政課」(caring courses) 開始,追蹤這些女人的家庭與教育背景,以及課程結束後的就業狀況,在長達 12 年的田野觀察與民族誌研究中,Skeggs 指出這些被主流價值排斥的女人,如何從被看成是「危險、污穢、有威脅性、反動、病態與不賢慧(without respect)」的社會成見中(Skeggs, 1997: 1),根據其僅有的文化資本(擅長於家事),進入學院選修相關的課程,取得家政課的資格,得以投入低薪的勞動市場。Skeggs 所要分析的是這些社會的弱勢者,她們在經濟與教育都貧瘠的社會背景中,如何盡其所能地不再讓自己失去已是寥寥無幾的稀少資源,選修家政課程是她們已經得

心應手的能力,雖然成為專業的家管員無法使她們從被累積的資產轉 變成資產累積者,最多只是停損而已,否則將而臨更困窘的失業處境 (1997: 116) •

很顯然的,Skeggs 的分析是從 Bourdieu 的資本概念與場域來界 定白種女性的社會位置與工人階級的現實處境,進而實質地理解其有 限的社會空間中的「必要」生存策略。此外,Skeggs 也深受 Foucault 的現代規訓與權力的生產性的影響,從而分析家政課程的規訓技術如 何建構「賢慧」(respectability)的女性主體。²⁰ 根據 Foucault 的系譜 學, Skeggs 追溯家政課的歷史背景,原本是19世紀中產階級教化工 人婦女如何理家、照顧弱小而設,背後反應的是對工人女人的成見 ——「危險、污穢、有威脅性、反動、病態與不賢慧」,是社會的不 定時炸彈。因此,提供家政課程是一種文化的規訓,讓受訓的工人 婦女能夠因此而樂於理家並引以為天職,杜絕社會的後患(Skeggs, 1997: 41-55)。所以,當工人女性選修這些課程時,通過種種規訓 (如要受訓者列出指定環境中28個骯髒點等等),培養出家管的相 關慣習、隨時自我監督、處處警惕、時時以他人為重、犧牲小我, 成為一個不自私與有責任感的人,賢慧的女性主體於焉產生(1997: 56-73, 160-169) •

如果對女性主義的界定是爭取兩性平權、(經濟)獨立、擁有高 度自主性與掌控性,那麼 Skeggs 所分析的這些工人女性似乎和女性 主義格格不入(Skeggs, 1997: 149),因為工人女性不僅肯定主流「女

²⁰ 從 Skeggs (1997) 分析 "respectability" 的歷史意義看來,指的是對女人在家 事、育兒與理家方面能力的評價(Skeggs, 1997: 2), 所以正是中文所慣用的 「賢慧」女人,如果翻成「敬重」勢必無法貼切地形容出「賢慧」所指涉的「女 主內」的意涵。

主內」的價值觀,以「低賤」的地位為恥,努力經營自己去成為道地 賢慧的女人,讓他人可以依靠,並從他人的讚賞中獲得自重與自信 (Skeggs, 1997: 139-159)。於是,成為賢慧的女人是開女性主義的倒 車嗎?還是女性主義的女性不只是一種樣式,而是萬般姿態?還是學 院的女性主義和工人女性的生活經驗完全脫節,忽略女性的多元而貌 與計會的複雜性?

顯然的, Skeggs 所要立論的是這些賢慧的經營者也都是女 性主義者,因為成為腎慧是一種必要的生存策略(virtue made of necessity)。此外從家政課程的規訓中,學員不僅僅只是被文化所收 編,同時也讓學員產生責任感與成就感。如此一來,工人女性長期經 營腎慧的特質,爭取計會中的一席之地,顯示的正是服從的矛盾性, 在認同文化中所建構的責任感與自信,挑戰社會對工人女性的成見與 排斥(Skeggs, 1997: 161)。究竟, Skeggs 所分析的賢慧女人是純然 被主流文化所收編?還是可以看成是有效的身體政治?判斷的關鍵心 需從特定的身體慣習與計會場域中來進行分析。因此,收編與抵抗都 不能抽離於所在的社會處境中去原則性地理解。反之,社會慣習與場 域中的象徵統治已經界定了社會準則。問題是努力達成社會準則的是 否就是被收編?反之,那些不合於計會準則的是否就是抵抗?還是合 於準則的慣習中可以產生抵抗?後者是女性主義身體政治的主要行動 策略。工人女人經營腎慧的種種技巧可以產牛抵抗,因為就其所處的 社會場域而言,將有限的生活技能與無償的家務勞動經營成家事管理 的專業並成為有給勞動,新的身份認同伴隨著社會地位向上移動,算 是有效的身體行動策略。

五、結語

最後,本文的結論是 McNay 和 Butler 身體政治的對比,並不是 是非的選擇題,而是發掘兩者間的互補性,缺一不可。因為即使掌握 了社會慣習與場域的複雜性,如果忽略「低賤者」的政治行動力,就 只能從主流價值來再製象徵鬥爭,於是 McNay 在 Bourdieu 理論的影 響下,仍然無法免於落入社會決定論的窠臼。反之,如果只是抽象地 強調「低賤者」的政治行動力,無法落實於具體的歷史與計會脈絡中 來討論,那麼所有口頭的分析,那些所謂差異政治的描述,都只能是 文字的遊戲與過度詮釋,說好聽點是精神勝利,說難聽點是嘴裡罵著 「兒子打老子」的 Π Ω 。

從 McNay 和 Butler 的互補性中,開啟了一扇窗,讓我們看見應 該從弱勢者的場域與社會慣習中,去仔細地層層分析其象徵鬥爭,探 討(而非過度詮釋)弱勢者收編與抵抗雙重張力中的行動策略。當 然, 並非所有的計會化中都有抵抗; 而目, 看似成功的抵抗可能只是 更深地被主流文化所收編。這也正是女性主義身體政治之所以複雜與 難於下斷論之處。但是也正因為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女性身體觀的 研究更應朝向女人現實的計會脈絡中去落實身體觀的多元性與複雜 性,探討女性身體政治行動的矛盾性。

參考文獻

- 何春蕤 (2001) 〈性、權力與鋼管辣妹 pub: 一個田野觀察〉,《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44: 167-199。
- 周華山(2000)《性別越界在中國》。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林宇玲(1997)〈解讀菜蒂思巴特勒的性/別理論〉,《婦女與兩性學刊》8: 239-263。
- 黄淑玲(1996)〈台灣特種行業婦女: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03-152。
- 廖朝陽 (1995) 〈重述與開放:評巴特勒的「造就身體」〉,《中外文學》24(7): 122-129。
- 蔡宛容(2001)〈從身體到「身體政權」——探析女性「子宮切除後」的論述〉,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藍佩嘉(1998)〈銷售女體,女體勞動:百貨專櫃化妝品女銷售員的身體勞動〉, 《台灣社會學研究》2:47-81。
- Adkins, L. (Ed) (2004) Feminists evaluate Bourdieu.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Bevir, M. (1999) Foucault and critique: Deploying agency against autonomy. *Political theory*, 27: 65-84.
- Bartky, S. L. (1997) 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In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Katie Conboy et al. (Eds.) (pp. 129-15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ordo, S.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rdo, S. (1997) 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 In Writing on the

- body: Femal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Katie Conboy et al. (Eds.) (pp. 90-11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ook, B. (1999)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 New York: Longman.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a)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b) *Homo academicus*. trans. by Peter Collie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8) Practical reas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Polity.
-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utler, J. (1989) Focault and the paradox of bodily inscrip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6(11): 601-607.
-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2004) Bodies and power revisited. In D. Taylor & K. Vintges (Eds.), Feminism and the final Foucault (pp. 183-194).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rossley, N. (2001) *The social body: Habit, identity and desi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Conboy, K. et al. (Eds.) (1997)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I. & Lee Q. (Eds.) (1988) Feminism &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igeser, P. (1994) Performativity trouble: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essential subjec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3): 655-673.
- Dudrick, D. (2005) Foucault, Butler, and the bod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3(2): 226-246.
- Foucault, M. (1973)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 punish.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Foucault, M. (1985) The use of pleasure.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tens, M. (1996) Imaginary bodies. New York: Routledge.
- Hacking, I.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ntopoulos, K. (1993) The logics of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w, J. (2000) The politics of breastfeeding: Assessing risk, dividing labor. Signs, 25. 405-450
- Lovell, T. (2000) Thinking feminism with and against Bourdieu. Feminist theory, 1(1): 11-32.

- Lovell, T. (2003) Resisting with authority: Historical specificity, agency, and the performative self.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 1-18.
- McNay, L. (1992) Foucault and feminism: Power, gender and the self.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cNay, L. (1999) Gender, habitus and the field: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limits of reflexivity.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6(1): 95-117.
- McNay, L. (2000) Gender &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ottier, V. (2002) Masculine domination: Gender and power in Bourdieu's writings. Feminist theory, 3(3): 345-359
- Shildrick, M. (1997) *Leaky bodies and boundaries: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bio)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keggs, B. (2001) The toilet paper: Femininity, class and mis-recogni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4(3): 295-307.
- Skeggs, B. (2003) Valuing class. London: Routledge.
- Turner, B. (1996) *The body &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Debates Between Lois McNay and Judith Butler on **Feminist's Body Politics**

Shiu-Ching W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Both Foucault's analysis of the docile body and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gendered body held by many feminist theorists such as, to name just a few, S. Bartky, S. Bordo, M. Gatens, J.Butler and L. McNay. Although not so similar deep down, these feminists share the core idea that body is not given, nor is it everlastingly fixed; instead, body is made, shaped, disciplined and enabled by a set of social (political) relations. However, given the consensus view of body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these feminists disagree at the views about how body resists, revolts, and liberates. The departed routes, to my understanding, reflect the separate theoretical influences of Foucault and Bourdieu on feminists' body politics. Feminists, who highly influenced by Foucault, incline to take gendered body resistance to be a viable political movement through Foucault's 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 By contrast, feminis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urdieu, who shows how women's habitus as a result of the unconscious fit between the dominated and the dominant, a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viability of body resistance.

Important questions need to be addressed with regard to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the body resistance. Why 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ody useful for body resistance? As far as gender is concerned, is it not the case that women's body is only too docile to negotiate to their advantage? How can women's docile and habitual body turn their weakness into great advantage? I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ody leads to accessible body politics, why would it lead to different crossroads for feminists? Body politics? Which route to take?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the options now available?

The paper will discuss the debate between McNay and Butler on the body for the sake of making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mod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ody.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ontrast serves three purpos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hesis of this paper, namely, both views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ody can be complement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a consistent whole. First, the contrast between McNay and Butler reflects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influences, i.e., McNay's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vs. Butler's Foucault's perspective. Second, although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ir theoretical mentors, both McNay and Butler challenge their mentors' theoretical inconsistencies by taking gender identity into account; in thus doing, both contribute to the new alternatives to the feminist body politics. Third, both modes of body politics can be complemented by putting the forces of performative resignifications of the abjected within the specific material contexts of bodily habitus and social fields, in order to go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freedom and determinism, and to bring out how bodily habitus negotiate its way within the social constraints to its own advantage, and in thus doing, to its limited freedom. The body that has been socially constructed, as I will demonstrate, has limited freedom within social constraints. The embodied resistance, to my conclusion, invokes neither the abstract notion of the subject, nor any room for social determinism

Key words: embodied action, body politics, M. Foucault, P. Bourdieu, L. McNay, J. Butler

◎作者簡介

吳秀瑾,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哲學、 倫理論、科學哲學等議題。

〈聯絡方式〉

E-mail: maywu@phil.ccu.edu.tw